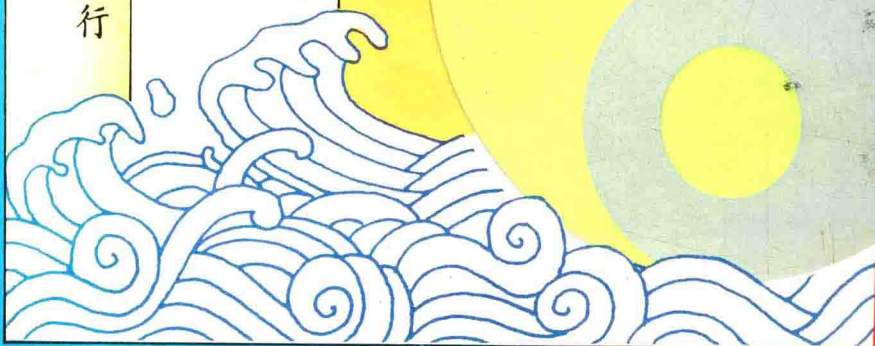


中國哲學叢刊

譚嗣同變法思想研究

王 樾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王 樾 著

譚嗣同變法思想研究

——從仁學的思想理則析論譚嗣同的變法理論與實踐

臺灣學士書局 印行

譚嗣同變法思想研究：從仁學的思想理則析論譚嗣同的變法理論與實踐／王 樾著--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民79，

6.158 面；21公分

參考書目：面 151-158

ISBN 957-15-0116-6 (精裝)--ISBN 957-15-0117-4 (平裝)

1.(清)譚嗣同一學識一哲學 2.(清)譚嗣同一學識一政治
127.82

譚嗣同變法思想研究(全一冊)

——從仁學的思想理則析論譚嗣同的變法理論與實踐

著者：王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發行人：丁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八號

電話：三三六三三六

FAX：三三六三三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〇〇號

印刷所：明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永和成功路一段四十五號

電話：九二八七四一

地址：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座

電話：三八〇五八〇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初版

定價：精裝新臺幣一七〇〇元
平裝新臺幣一二〇〇元

12701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116-6 (精裝)
ISBN 957-15-0117-4 (平裝)

自序

近年來發表了幾篇有關研究譚嗣同的文章，例如：「衝決網羅與無力回天——略論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悲劇性格」、「從仁學的思想理則析論譚嗣同黜儉崇奢之經濟思想」、「晚清思想的批判意識及其與五四反傳統思想之關係——以譚嗣同的變法思想為例」。這些作品的水準雖未盡理想，但師友們卻給予我許多鼓勵並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批評與建議，激發了我進一步研究的興趣，於是才有這篇論文的嘗試。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所長龔鵬程教授。我是個不慣於參加活動，工作步調又比較遲緩的人。自我在淡江大學歷史系任教以來，課業及行政工作相當繁重，如果沒有這位好友的督促與激勵，我可能不會那麼勤於研究工作並參加一些學術會議。此外，在寫作期間，我曾兩度赴大陸訪學，收集相關的資料，對於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史所、哲學所朋友們的協助，也由衷地感謝。

先師傅樂成教授生前常訓勉我，爲學是一串漫長而艱苦的歷程，要沈得住氣，要耐得住寂寞；求學的目的，不在於名利的追逐，而在於自我心靈的啓發與成長，經由價值之自覺，選定自己的人生目標，踏踏實實地自我實踐，不必世俗名利之襯托，生命的莊嚴與意義將自然而然地得以彰顯。這十餘年來，在學問上我雖沒什麼顯著的進步，但樂成師的教誨始終不

敢稍忘。這本小書雖微不足道，但畢竟是我近年來刻苦向學的一點成果，我願獻給樂成師，感謝他老人家啓發了我的史學心靈，不懼困窮，一心慕道，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永存一分溫情與敬意……。

一九九〇年春於臺北淡江大學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存在的悲苦與疑惑——譚嗣同身世、人格、思想

淵源之分析

第一節 特殊的性格、駁雜的思想

第二節 存在的悲苦與疑惑——譚嗣同成長的心路歷程

第三章 仁學的思想理則與批判意識

第一節 仁學的基本理論——「仁一元論」的建立

第二節 仁學的思想理則：「仁——通——日新——平等」

第三節 仁學的道德理想與批判意識——心力與衝決網羅

第四章 譚嗣同變法思想之剖析——現實關懷及對傳統的反省……六九

第一節 譚嗣同政治思想之剖析……………七〇

第二節 譚嗣同經濟思想之剖析……………八一

第三節 譚嗣同社會倫理思想之剖析……………九三

第五章 譚嗣同變法策略之分析……………一〇三

第一節 從「華夏之道不可變」到「法之當變」……………一〇四

第二節 譚嗣同的變法策略與實踐……………一一一

第六章 結 論……………一二三

附 錄：譚嗣同年表……………一四三

徵引及參考書目……………一五一

第一章 緒 論

譚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是促成晚清思想急遽轉變的啓蒙思想家之一，同時，也是一位依據其思想力行實踐，投身於變法維新、救亡保種，最後不惜壯烈犧牲生命的悲劇英雄。

十九世紀九〇年代，是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危機意識高漲、最激動、最徬徨的時刻之一，也恰是譚嗣同思想逐漸成熟的關鍵期，^①那時適值中日甲午戰敗，德帝強佔膠州灣，瓜分危機，迫在眉睫，在西力強勁衝擊，傳統欲振乏力的雙重困厄下，譚嗣同奮袂而起，抱著救亡與啓蒙的時代使命感^②，將所學、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所盼凝聚淬鍊，寫成了一部《仁學》^③。在實用的意義上，《仁學》是他提倡並從事政治變革的思想依據與辯論武器；就生存與思想互動的角度而論，《仁學》是他基於上述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由他個人的存在感受所激發出來的自覺反應與救國對策；就哲學意義而言，《仁學》之提出，代表了中國知識份子在西方強勢文明的挑戰下，在傳統文化面臨解體的危機下，中國知識份子自創一套新哲學體系的企圖與抱負^④，盼能藉此重新安身立命，定國安邦，流露出讀書人的文化悲情與純粹哲學思考的氣息^⑤；而譚氏最後的可逃拒逃，身殉變法，一方面可說是他人格特質的自然

流露，另一方面也正是仁學思想推演、實踐的必然結果。^⑥

雖然，對譚嗣同的哲學成就各人評價不同^⑦，雖然對他的死難論者頗有爭議^⑧，雖然，他的思想不臻成熟，且含有唯心與唯物之矛盾^⑨，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排滿革命與保皇變法的疑惑以及同情基層，贊譽陳涉、吳廣之揭竿起義，但卻又厭惡愚民倡亂的種種糾纏……^⑩，但他在歷史舞臺上一閃即逝的狂飆英雄式演出，卻造成震撼，對於中國近代歷史由晚清走向民國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譬如：在政治思想史上，他促成晚清政治思潮拋下洋務論，積極走向變法論，與康有為共同將變法論推到最高峰^⑪；就政治變革的行動來看，譚氏雖是變法論者，但他徘徊於變法與革命之間的論調以及以熱血作論證（殷海光之語）的烈士事迹，使得許多熱血青年在唐才常自立軍失敗以後，紛紛走向革命，可說在救國行動的路線上他隱隱導引了由變法走向革命的新趨向^⑫；他對於三綱倫常的批評以及建立平等、自由新倫理的主張，也與日後五四時期反傳統的思想有密切的聯繫；^⑬此外，他提出的衝決網羅、心力、日新等觀念及流露出的俠風，對於日後中國青年勇於突破保守性格、打破權威崇拜，冒險進取、尊新崇變，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⑭

基於上述，筆者認為，站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譚嗣同應是一個非常值得作深入研究的對象，尤其是對他的變法思想作有系統的通盤分析，將有助於將他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與地位作一適當的闡發與定位。

（按：中國大陸的學者針對譚嗣同所作的研究，據李文海、孔祥吉的收集調查，從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四止，已多達九十六篇，至今應已超過百篇，雖然各有見地，但不免

受限於中共統治階級狹隘的歷史框架，因此，筆者認為有客觀、適當作歷史定位的必
要。）

那麼，所謂思想史的角度又是什麼呢？思想史的概念雖含混，但其核心思想，我們仍可借助美國思想史家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的說法來作一說明。所謂思想史「就是人類對於他們本身所處環境（Situation）的意識反應（Conscious response）；這些意識反應有時又會反過來指導人類的行為」^⑮。依此定義看來，我們發現思想史所關切的不僅是要探索觀念的歷史（history of idea）——着眼於某些觀念的歷史發展，研究某些觀念如何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從而分析這些觀念之間的衍生關係與邏輯關係以及其他觀念之間所產生的激盪^⑯；更包括人類意識生活的整體。因此思想史之研究必須與整個歷史的發展取得聯繫，包括存在感受、時代背景、社會結構、政治情勢、經濟條件、文化流變……掌握其相互互動、相互影響的密切關係；精簡言之，即必須將思想活動放到歷史處境的架構中去理解。^⑰

因此，筆者以為比較周全的思想史研究態度似為須將「身處的生存環境」與「意識反應」兼顧，亦即先將研究對象放到他身處的時代脈絡中來觀察分析；再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析論其思想如何針對生存環境作自覺反應；其反應是否有效？有何限制？然後再將這些思想、反應納入某一觀念發展的歷史中來評比、研究，判定它的價值和意義。

基於此一考慮，筆者欲研究譚嗣的變法思想，當然應扣緊「生存環境與意識反應」、「抽象思維與具體實踐」、「思想體系與構成體系的基本思想理則」……之間所衍生的關係

及影響；因此，筆者謹以「從仁學的思想理則析論譚嗣同的變法理論與實踐」為主軸，擬對譚氏的變法思想作一有系統的探究。筆者選擇最能代表譚氏思想的著作《仁學》為核心，一方面剖析譚氏的生存處境與仁學思想的關係，一方面將仁學的思想由內而外展開，逐步查證其系統內部是否有一定的邏輯關聯？其基本的哲學理論為何？思想理則為何？如何由抽象的哲學理論，透過時代背景的刺激，而提出現實層面的關懷及解決之道？最後再將之放在晚清歷史思想流變的長流裏，作一評析，來判定其價值、意義以及正、負面的影響。為便利析論之進行，筆者擬就如下架構：

- 存在的悲苦與疑惑——譚嗣同身世、人格、思想淵源之分析
- 仁學的思想理則與批判意識
- 仁學基本理論之分析——「仁一元論」的建立。
- 仁學的思想理則：「仁——通——日新——平等」。
- 仁學的道德理想與批判意識——心力與衝決網羅
- 譚嗣同變法思想之剖析——現實關懷及對傳統的反省
- 譚嗣同政治思想之剖析
- 譚嗣同經濟思想之剖析
- 譚嗣同社會倫理思想之剖析
- 譚嗣同變法策略之分析
- 從「華夏之道不可變」到「法之當變」
- 譚嗣同的變法策略與實踐

• 譚嗣同在晚清思想史上的意義及影響

(一) 譚嗣同在晚清思想史上的意義

(二) 譚嗣同變法思想對後世的影響

現依此架構，逐層加以析論。

附 註

①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確實是晚清知識份子最激動的時刻之一，引發危機意識高漲的主要的關鍵性歷史事件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的挫敗。經過三十年由統治階層帶動的洋務運動，滿清仍然沒有達到預期富強的目標，不僅無力抗拒西方列強，甚且被昔日藩屬東亞小國日本所敗。甲午喪師辱國，對國人所造成的屈辱感似乎比鴉片戰爭更嚴重，因而在屈辱中痛加檢討，依據當時面臨的時代危機，嘗試從異於往昔的角度來找尋國家求生存途徑，有志之士，幡然改圖，認為僅限於器物層面革新，標榜船堅礮利的洋務運動，並非根本救國之道，同時意識到西方政教制度的優越所在及其背後支撐的學術思想，他們屢屢以明治維新之成功來激奮中國發憤，希望能在制度層次上革新，來達到救黃種於一線之目標。知識界的激動、奮發，我們可由康梁帶領的公車上書、甲午戰後報紙、學會之林立窺見一斑。而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運動，多次上書均無效果，但最後終能於一八九八年達到最高潮，固然有許多其他相關的因素，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民族危機感與知識界人心激越，思變確為極重要的支撐條件。而晚清的政治思想史也可說以九〇年代為一分水嶺，逐漸由變法論取代洋務論。因此，我們說十九世紀九〇年代是中國近代知識份子最激動最徬徨的時代之一。至於譚嗣同，就其成長歷程而言，也正是他的思想由保守變為激進的轉變時刻。他在二十歲所作的「治言」，還抱著強烈的漢族文化優越感，認為華夏之道不可變，然而和他在

三十歲以後的各種言論激烈的著述來比較，即可看出其中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而甲午戰敗正是關鍵所在。他在「上歐陽澥書」中云：「平日於中外事雖稍稍究心，終不能得其要領。經此創鉅痛深，乃始摒棄一切，專精致思。……詳考數十年之世變，……因有見於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不恤首發大難，畫此盡變西法之策，而變法又適所以復古。」在「報貝元徵書中」云：「……所謂道，非空言而已，必有所麗而後見。……衡陽王子……曰：道者器之道，……無其道則無其器，……苟有其器矣，豈患無道在？……無其器則無其道。……故道，用也；器，體也，體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這些言論一方面可說明他從保守變為激進的轉變，另一方面如「變法復古」、「器體道用」等觀念，係構成他日後變法思想的主要推動力，也同時是仁學的部份重要內容。因此，十九世紀九〇年代也正是譚嗣同思想轉變的關鍵期。許多學者在析論譚氏思想的成長背景常遠溯到鴉片戰爭，此一追溯雖無不當，但似嫌籠統，因為它適用於任何一位近代史人物。李澤厚認為分析譚氏思想的時代背景應以十九世紀九〇年代為重心，此一看法，非常正確（參見李澤厚、譚嗣同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一八三，北京，新華，一九七九年初版）。

所謂「救亡」，就是要挽救中國危亡，保國保種，如譚嗣同在甲午之後於瀏陽興算，在長沙成立南學會，就是為了作「善亡」之準備；所謂「啓蒙」，則是要在中西文化、現代與傳統的激盪中摸索，找尋中國文化、思想的新出路，具體的努力目標包括翻譯西書、追求新知、創辦學會、報紙，開辦新式學堂……。知識份子要肩負「救亡與啓蒙」的雙重使命，事實上從晚清一直延伸至五四時期。

《仁學》寫作的時間為從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到十二月間（西元一八九六年八月到一八九七年一月），前後花了五個月時間，草稿完成後，又攜去上海與梁啟超討論，一月後再定稿，全文五萬餘言。當時譚嗣同在南京以候補知府資格候缺，親睹官場黑暗，如鳥獸囚於牢籠，敗舟困於怒

濤，心靈徬徨，又憤於時局無所寄托，乃與楊文會遊，學習佛學，調節自我，鍛鍊心靈，思想爲之一變；又常往上海與辦時務報的梁啟超、汪康年商討學術及天下大事，以瞭解時勢。此時，康有爲已寫就《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梁啟超也寫就《變法通疏》、《西學書目表》等書，鼓吹變法已蔚爲時代主流；而嚴復所譯之《天演論》，已於光緒二十二年譯成，翌年起於國聞報刊載，呈現國人眼前，一時達爾文物競天擇之說，在學術界大爲轟動，在上述種種風潮刺激下，譚嗣同的思想更是日新又新，猛進不已，於是振筆疾書，完成《仁學》乙書。

梁啟超認爲《仁學》是部融會佛學、西學、國學的哲學著作，其目的在於發大心願，救中國，進而救全世界人類，梁啟超有云：「仁學爲何而作也？將以會通世界聖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衆生也。南海之教學曰：『以求仁爲宗旨，以有大同爲條理，以救中國爲下手，以殺身破家爲究竟。』仁學者，即發揮此語之書也。」（見譚嗣同全集，頁五一五，梁啟超，仁學序）。又如，李澤厚則指出，譚嗣同企圖以佛學唯識論爲基礎，融合古今中外思想來建造適應當時鬭爭需要的新體系，雖然充滿矛盾與混亂，但確實展現出自創新哲學體系的企圖與嘗試。而這番自創哲學新體系的抱負，後來由章太炎完成。主要原因之一是譚氏去世太早，不及完成成熟的思想體系。（參見李澤厚，譚嗣同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一九五）。

雖然譚嗣同的哲學思想體系不够嚴謹，思想也未臻成熟，但卻享有不錯的評價，不少治思想史的學者認爲譚氏思想頗具純哲學思維的氣味，其人也具備哲學家的氣質。例如李澤厚認爲，「譚嗣同大概是中國近代最富哲學氣質的思想家之一」（見李著，譚嗣同研究），又如郭湛波以爲譚氏的政治活動，雖甚耀眼，但一生的成就，卻以哲學成就最大（見郭著，《近代中國思想史》，第四篇，頁七十二，香港，龍門，一九七三年初版）。

關於譚氏身殉變法可說是他人格之自然展現及仁學思想推演的必然結果，請容於後面章節詳細分析。此外，亦可參閱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頁一〇七—一〇八。

聯經，民國七十七年初版。

⑦

有關對譚嗣同哲學成就的評價，常有極端的看法，推崇者如梁啟超，將他譽為「晚清思想界的慧星」，認為「僅留此《仁學》區區一卷，吐萬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掃蕩廓清之力莫與京焉。」

（見梁啟超，仁學序）。又說：「《仁學》一書，以公於天下，為法之燈，為衆生眼。」（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一五〇，啓業，六十一年十二月）。又如熊十力云：「自清季以來眞人物，唯復生一人足當之而已。」（見熊十力，讀經示要，卷二，頁一四九）。廣文，四十九年五月。又如馮友蘭云：「譚嗣同在經學方面雖不及康有為之煊赫有建樹，而在思想方面，則所著仁學發揮大同之義較康有為精密。……譚嗣同之思想……其中雖不免有不能融貫之處，然要不失為其時思想界之一最高代表也。」（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一〇二——一〇二二）。但是持反面批評的則認為蕪雜、混亂，不知所云，如章太炎云：「《仁學》拉雜失倫，如同夢寐。」（見章太炎，《人無我論》、「怪其雜揉，不甚許也。」）見章太炎，《自編年譜》）。關於譚氏之死難，向來亦有「死事」與「死君」的爭議。讚譽或同情譚嗣同身殉變法的學者比較偏向於「死事」的解釋，如楊一峰認為，譚氏之死難乃「其心力至高之呈露」，是「殉主張」或「酬皇帝的知遇」，不可謂其心迹相違。他說：「（譚嗣同）之一死，乃其心力至高之呈露，謂為殉主張固可，謂為酬皇帝的知遇亦無不可。謂他出處不慎，『幾於不智』則可；謂他不當殉其主張或酬答皇帝知遇，以致心迹相違，則不可。因為……失敗即一跑了事，在他即認為……幾於不仁，……死與不仁，二者必選擇其一，他只好選擇一死以成仁了。」（見楊一峯著，《譚嗣同》，頁七，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八年三月）。蕭一山以為：「然譚嗣固俠士，橫刀笑天，慷慨赴死，猶足徵中國捨生取義之精神。」（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四冊，頁一八五六。商務，民國五二年臺一版）。左舜生以為：「……他這是死事，而不是普通所謂盡節或盡忠。……政變中康梁出走而嗣同死。康梁出走是嗣同所造成的，他自己可走而不走，便是任俠精神的發揮，

9

也是湖南人性格的表現！」（見左舜生，〈譚嗣同評傳〉下，藝文誌，期廿九，頁二一）。對譚氏之死有譏評的學者，主要針對譚氏生前所言：「只有死事之理，絕無死君之理。」來印證其行為而提出質疑。如錢穆云：「豈君臣知遇之感，亦終不能自解，故臨時慷慨而出此耶？」「復生果以旬日知遇，遽忘其兩千載君主之慘毒，三百年滿廷之酷烈，竟自沒齒效忠，稱聖天子如常俗矣。然則復生之死，以仁學所謂衝決網羅毀滅君臣父子之倫常言之，不將為無意義之徒死乎？」「譚氏之持論，譚氏亦自違抗之。」（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頁六七七—六七八，商務，民國四十六年）。

譚嗣同的思想究竟是屬於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一直是史學界及哲學界主要爭論的問題。依據李文海、孔祥吉所作的綜合調查、分析，他們指出，中國大陸的學者從五、六十年代即已展開這項爭論，大體有三種觀點：其一、認為譚嗣同的思想屬於唯物主義陣營；採取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譚嗣同就像十八世紀西方的唯物論者一樣，堅持泛神論，反對有神論，堅持以物質性的「以太」作為世界本源，反對唯心主義的世界本源說，在認識論上也堅持唯物論的反映論。例如：楊正典的《譚嗣同早期思想研究》即持此種觀點。其二、認為譚嗣同的思想屬於唯心主義的陣營；例如：張玉田的《譚嗣同哲學思想的唯心主義實質》認為，譚嗣同的思想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又如侯外廬主編的《中國近代哲學史》及孫長江的《譚嗣同是唯物主義者嗎？》都認為譚嗣同的「以太」是一種神秘的精神實體，同時又把人的認識歸源於大腦，在認識秩序上則強調先知後行，因此，應該把他歸於唯心主義陣營。其三、認為譚嗣同思想中既有唯物的成分，又有唯心的成份；既有辨證的觀念，又有形而上學的因素，應該一分为二地看待譚氏的思想。例如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主張，譚嗣同的「以太」，並不是什麼「精神性的概念」，基本上是一個物質性的概念，但其中確有夾雜著唯心主義的觀點。上述這三種意見的爭論，焦點集中在對於譚嗣同所說的「以太」，到底應作如何的解釋。持第一種觀點的文章，把「以太」看作

是「高度抽象的物質概念」，而「以太」又是譚氏哲學思想的基本範疇，因此主張譚嗣同是唯物主義者；持第二種觀點的文章，把「以太」的本質視作精神的體現，因此把譚嗣同判定為唯心主義者。目前此一爭論仍在繼續進行。（以上參閱李文海、孔祥吉合編《中國史專題討論叢書——戊戌變法》，頁四十八—四十九，巴蜀書社，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事實上，學界除上述看法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觀點亦很有見地，例如：日本京都大學的教授小野川秀美認為，至於譚嗣同思想是唯物或唯心，實不必當作問題來討論。小野川教授所持的理由是，表面上看譚嗣同承認心力有絕對權威的想法與他對道器之辯的見解是相矛盾的，但譚嗣同的目標在於致力中國的復興以及救濟人類。救人、救國的根本在於政治革新與提倡科學，而心力是促使實現政治革新的原動力；而提倡並發展科學，必須從卑近而後始能達高尚（亦即從物質基礎著手逐層達於精神境界），所以，在實際救國、救人的實踐行動中，心力與道德之辯，並不會互相矛盾，可以同時並立，可以說兩者皆以革新為軸而互相補救。（參見小野川秀美原著，林明德、黃福慶合譯，《晚清政治思想研究》第四章「譚嗣同的變革論——其形成過程」，頁一八四，時報，民國七十一年五月）。

此外，又如李澤厚在處理唯心唯物之爭後說：「我以為與其憑幾個公式去爭論譚嗣同到底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還不如具體研究問題，深入揭露和分析矛盾，論證譚嗣同的思想各方面如何具體聯繫……，如何既矛盾又統一，以展開問題的全部複雜豐富的性質，並歷史地……評價他那「以太——仁——通——平等」的……思想主線」（參見李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二四八）。李澤厚這種掌握思想主線，不做形式之爭，擺脫政治框架，具體研究問題，析論並展開譚氏思想的豐富、複雜面及其相互關係之主張，與筆者的觀念、態度十分吻合。筆者研究的結果認為：譚氏哲學思想的基本理論係基於「仁——通——日新——平等」此一思想理則所建立而成的「仁一元論」；不僅是一本體架構而已，同時也代表一種道德理想。他所謂的「以太」，並非僅限於純粹的物質，而是兼具實體和力的觀念，是一種相當類似於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氣」的觀